

“全球南方”的历史轨迹和时代使命

□ 杨洁勉 沈若豪

〔提 要〕 “全球南方”一词不仅承载地理属性，还蕴含深厚的政治意涵，反映了世界历史的曲折演进。从二战后的独立解放运动到当今的经济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日益提升。面对内部差异与多样性带来的挑战，以及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杜撰“全球东方”话语陷阱将中国从“全球南方”剥离以制造新的国际对立格局的外部压力，“全球南方”应当强化历史自觉、明晰时代使命。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正推动相关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并力争通过自主话语体系同国际话语体系的整合，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 全球南方、全球东方、国际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杨洁勉，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若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4) 5 期 0024-21

国际话语是国际问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提炼，“全球南方”等词汇的热度上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世界主要力量的板块重组和国际大势的发展方向。世界主要力量对“全球南方”的各自认识和界定体现了不同的意蕴和战略，代表着它们对国际格局重组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不同愿景和着力。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正在加强南南合作和推进南北对话，努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美国及其一些盟友有意把中国排斥于“全球南方”之外而归入“全球东方”，强调以美欧为主的“全球西方”和以中俄为主的“全球东方”正在进行“民主和专制”之争。

有鉴于此，对“全球南方”“全球西方”“全球东方”等问题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明确内外形势下的战略定位，发挥国际积极因素的作用和排除消极因素的干扰，促进世界主要力量板块朝着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方向发展，进而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以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

一、全球各方兴替的意义和影响

在当前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和研究中，不少始于二战结束时。在如此短促时间跨度下的解读，往往不能深刻认识其意义和影响。因此，需要在以史为鉴的研究和实践中做到辨是非、知兴替和鉴未来。

人类在地球上的足迹始于百万年前，五六千年前国家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跨入文明社会，并在世界各方共同推进着人类历史的进步。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曾指出：“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灭亡的。”^[1]当时处于“全球南方”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照亮了还处于荒蛮落后状态的“全球北方”，带动着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指出的，“它们（古代文明）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2]

[1] 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6-87页。

大约在三四千年前，一些地区进入了国家从小到大的兼并和组合历史时期。在东亚大陆上，古代中国由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逐步统一为秦汉。在南亚大陆上，古代印度的孔雀王朝在内外征战中实现统一。与此前后还有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等。这些强势大国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军事力量、交通和通信等条件下称雄一方和傲视天下。需要说明的是，三四千年前西半球的文化和文明发展虽然丰富多样，但受制于技术上的缓慢发展状态与生产率的最高限度，^[1]它们更多地是以各自独立的文化和政治实体存在，难以形成足够跨越地理阻隔和文化藩篱的统一大帝国。

但是，大约在五百年前，“全球北方”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世界的主导者。随着15世纪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资本主义的兴起，全球开始连成一片，一些欧洲国家因其经济科技发展和政治社会变革脱颖而出，并且在亚非拉进行剑与火的殖民拓疆，成为“世界中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后来居上，在一战前后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建立西方阵营。这样，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等不仅是地理方位词汇，还被赋予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体现了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变化和发展。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受到越南战争、经济危机和石油危机等多重冲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美国霸权的式微和世界五大力量的形成。1971年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曾经是世界第一位……这只是25年以前的事。当我们展望今后5年、10年或许15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大陆，当然还有日本。”^[2]此后，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国际社会对世界权势东移问题从学术讨论进入到现实应对，越来越

[1]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第229-230页。

[2] “Remarks to Midwestern News Media Executives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Domestic Policy in Kansas City, Missouri,” July 6, 1971,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midwestern-news-media-executives-attending-briefing-domestic-policy-kansas-city>.

多的人不仅认为 21 世纪是“亚洲世纪”，而且还认为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时至今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虽然继续朝着“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方向发展，但也要看到“东弱西强”和“南穷北富”是一时难以改变的现实态势。^[1]从生产力水平、科技创新到制度建设和话语权构建角度看，“全球南方”依然在经济实力、社会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与“全球北方”存在深刻的差距。

以上可见，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不断有国家和地区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或黯然退场，而欧美的领先则只在很小一部分的时间。但还应看到，国家兴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周期呈加速嬗变趋势，以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与农牧时代相比，速度差别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此关键时刻的延误很可能导致千百年的落伍。

二、“全球南方”的历史轨迹

在欧洲大国自诩“世界中心”的年代，它们把其他地区视为受其支配的边远地区。二战结束以来出现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等词汇，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分化与组合的战略态势。

（一）“全球南方”的前世今生

冷战开始后，大西洋两岸的美欧结成西方联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东方阵营。几乎与此同时，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多在政治上“不结盟”，在经济上努力脱贫向富。二战结束以来，这一群体先后被称为“前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世界”“全球南方”。不同的称呼分别代表着“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意涵和不同诉求。

[1] 参见杨洁勉：《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欧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7页。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在此阶段，“全球南方”的主要诉求是反对殖民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开始进入谋求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以及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法国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笔下的“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标志着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向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1]

1980年，卸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以社会党国际主席的身份向“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作的报告中（后被称为《勃兰特报告》）首次明确区分了人均GDP相对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与较贫困国家，后者中的大多数位于虚构的“勃兰特线”南侧，该线从里奥格兰德河延伸到墨西哥湾，穿越大西洋，经过地中海，穿越广袤的中亚，最终到达太平洋。^[2]1982年，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首次南南合作会议，探讨了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这也标志着经济发展逐步取代政治独立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政策的优先议题，^[3]“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经济属性逐渐凸显。此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3年推动“打造全球南方”项目则通过将南南合作纳入政策优先议程，进一步将“全球南方”完善为符合全球化浪潮的时代概念。^[4]

[1] Palieraki, E,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World’: Alfred Sauvy and the Birth of a Key Global Post-War Concept,”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January 2023, pp.1-30.

[2] Stewart Patrick and Alexandra Huggins, “The Term ‘Global South’ Is Surging. It Should Be Retired,”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sts/2023/08/the-term-global-south-is-surging-it-should-be-retired?lang=en>.

[3] 徐秀军等：《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国际论坛》2024年第2期，第3-32页。

[4] 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16-120页。

（二）“全球南方”的概念辨析

“全球南方”既有其与生俱来的地理属性，亦有伴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特征的政治意味。前者意指位于地球赤道以南的南半球国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因此国际社会习惯上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则是对“南方国家”概念的承续，主要指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 为了表明与发达国家代表的“全球北方”间存在的系统性不平等与本质性差异。

一般认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演进的两大特征：“全球”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凸显了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2]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公平正义的共同主张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性。^[3]

（三）“全球南方”地位的上升

在个体和集体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南方”呈现群体性崛起之势，其在地区和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不断增长，正在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重要力量。

第一，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开创国家建设。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之初的成员国只有51个，但在1975年和1984年时分别达到144个和159个，大多数新成员国来自新独立或解放的亚非拉地区。^[4] 亚非拉国家摆

[1] 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世界知识》2024年第7期，第38-44页。

[2]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3] 《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人民日报》2023年7月26日，第2版。

[4] 《会员国的增长》，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growth-in-un-membership#1960s>。

脱殖民统治和西方压迫后纷纷开展国家建设运动，增强国家身份意识，致力于巩固国家主权和独立。

第二，在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中凝聚和发展集体力量。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大体上每隔20年左右就有新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的合作高潮时期。在区域合作方面有亚非会议（1955年）、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以及拉美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等。1961年正式开始的“不结盟运动”，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并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

第二阶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苏两极中异军突起。以下是其主要标志：前后三次石油危机使能源大国借助石油武器改变了国际能源政治的参与情境；始于1973年、持续9年之久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最终使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成为现实，并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完整，也最有实践性的海洋法典；1974年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中，第三世界国家首次就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认真分析世界各种矛盾斗争及其背后的逻辑规律后，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第三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第三世界变成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全球化中的亚洲经济起飞，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全球南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逐渐取代了更具等级色彩的“第三世界”称谓。^[2]

[1]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https://legal.un.org/avl/pdf/ha/ga_3201/ga_3201_ph_c.pdf.

[2] “Report of the Sou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December 199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6143?ln=en&v=pdf>.

第四阶段，2008 年至今，发展中世界成为“全球南方”。在此期间，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建章立制并快速扩容，在全球治理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2 年至 2024 年，印尼、印度、巴西三国相继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使“全球南方”概念进一步具体化、实践化。此外，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稳步运行和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格局朝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第三，持续递进和加速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战结束的近 80 年来，亚非拉国家实现“三级跳”，其发展和视野从国家走向区域和全球，体现了整体性觉醒、群体性崛起、前瞻性发展的时代意义。21 世纪以来，一些区域性及跨区域性的南方国家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并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这是“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明证。以金砖国家为例，金砖合作机制表明，“全球南方”能够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另一种选择。沙特和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坚定的盟友，而伊朗是美国的宿敌且与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关系紧张。然而，伊朗和沙特在中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且两国能够加入一个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国际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说明这些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更能说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顺应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1]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走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2]

三、“全球南方”的时代使命

“全球南方”在新时代肩负起推动全球公平与多元化发展的使命。这一使命要求“全球南方”在合作中相互支持，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

[1] 翟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系统演进的动力与前景》，《人民论坛》2023 年第 24 期，第 112-116 页。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动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智慧。

（一）“全球南方”未来发展的方向

值此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和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全球南方”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作为战略思维和前瞻行动，重点要放在解决困难和应对挑战之上，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动力继续向前。

第一，增强实践自觉和推进发展共同体。“全球南方”各国内部面临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在国际上面临有效应对气候融资、粮食安全、债务减免、健康问题、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有效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和任务，发展仍是“全球南方”的第一要务。“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实体，而应当也可能成为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经济规模不一、文化传统多样、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目标相同的发展共同体。从整体上讲，“全球南方”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时期。在目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全球南方”国家更加坚定了寻求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政治自觉，也对以发展模式多元化为主要内核的国际秩序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全球南方”内部差异很大，但都需要在政治独立、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后，还要在全面发展和重点提升上继续努力，后者如在更高层次上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平衡生态等。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等国需要发挥引擎作用，东盟、海合会、南方共同市场等需要加强一体化进程，还要加大“全球南方”的扶贫脱贫的力度，争取在30~50年内基本消除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状态。在新形势下，“全球南方”各国不仅需要继续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还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在经济社会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划时代的进步，更要以集体力量与全球各方和世界各国共同建设新时代。

第二，增强历史自觉和推动历史潮流。“全球南方”首先要重新认识和规划自身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从纠正历史遗留的不公正到建设当今时代的新公正。历史进步的基础是物质文明，“全球南方”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和造福于民。同时，“全球南方”还要在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上

作出应有的贡献,要善于倡导代表历史进步的思想理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为此,“全球南方”不仅要提出具有长期影响的原则、战略和理论,而且要重视建章立制和叙事话语,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建设性力量和切实保障历史的进步。

第三,超越地缘博弈和建设美好未来。如同所有的研究一样,只有站在历史的前沿和理论的前沿才能做到方向明确、前进有力。刘德斌等学者指出:不同于既有研究局限于一系列与超级大国地位有关的指标的做法,“全球南方”研究从大国博弈和权力转移理论,从“修昔底德陷阱”争论的藩篱中跳脱出来重新评估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变迁,从而抓住了“全球南方”的浮现这一深刻变革的主线,有利于理解多极世界的“戏剧性”和“复杂性”。^[1]“全球南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阵营政治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值此美西方大力进行大国竞争和地缘博弈之时,“全球南方”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相反,“全球南方”也要增强地缘政治意识,加强地缘战略研究。德国发展与可持续研究院在其发布的名为《地缘政治、“全球南方”和发展政策》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南方’的行为者不再只是地缘政治冲突的旁观者,而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全球南方’不同于以往充斥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的集团,正在形成并创造一种全新的国际交流和理解形式。”^[2]例如,金砖国家扩容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加快推进经济全球化新架构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构建。

但是,“全球南方”还需要超越地缘博弈,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和更加长远的时期内运筹全局,坚持合作共赢为先,坚持建设互动为先,并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处理与“全球西方”的关系,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

[1]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9页。

[2] Stephan Klingebiel, “Geopolitics, the Global South and Development Policy,” Germ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December 2023, <https://www.idos-research.de/policy-brief/article/geopolitics-the-global-south-and-development-policy/>.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全球南方”积极提出应对地缘冲突和全球问题的治理方案，拒绝卷入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尤其是“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超越了置身事外的外交中立和盲目跟风的外交追随，体现出一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觉醒，成为其全方位崛起的重要表现。如巴西总统卢拉曾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中）讨论谁对谁错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停止战争并加紧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更具包容性、合法性和有效性。”^[1] 中国学者牛海彬指出：虽然“全球南方”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其始终强调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两个路径的重要性，反映出“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开放包容潜力的认同与追求。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并不是为了“反西方”，而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寻求与西方更好地共存。^[2] 西方学者托马斯·法兹（Thomas Fazi）也指出：“全球南方”塑造的新国际秩序，并非全盘抛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仅靠“全球南方”来完成这项任务，而是要与西方国家一起，打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从而完成国际关系的“范式转换”。但对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是否能有如此容人的雅量实在令人怀疑。^[3]

第四，“全球南方”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第一要务仍是发展，它的发展理论也需要超越美西方。印度学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受制于发达国家设定的旧有认识框架，没能从事实出发，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而这反过来制约了南方国家的

[1] “Press Statement by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Following the Official Visi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Pedro Sánchez,”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March 6, 2024, <https://www.gov.br/planalto/en/follow-the-government/speeches-statements/2024/03/press-statement-by-president-luiz-inacio-lula-da-silva-following-the-official-visit-of-the-president-of-the-government-of-spain-pedro-sanchez>.

[2]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年第11期，第26页。

[3] Thomas Fazi, “The Dawn of the Brics World Order,” August 30, 2023, <https://unherd.com/2023/08/the-dawn-of-the-brics-world-order/>.

发展。值得欣慰的是，以联合国南南办公室为代表的平台机构正在以实际行动（如南—南银河数字平台、南—南信托基金、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解决方案实验室等）促进、协调和支持“全球南方”群体在正确的轨道上和平发展。

（二）“全球南方”面临的主要挑战

有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南方”主要面临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三个方面的矛盾。^[1]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南方”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全球南方”问题的优先性和迫切性亟待进一步关注和推动落实；从“价值误导”到“方向误导”，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刻意引发“全球南方”的阵营分化；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需求的差异加剧“全球南方”国家总体进步任务的艰巨性；“发展错位比较”认知误区带来的消极影响。^[2]还有国外学者认为，“全球南方”中领导地位的模糊或缺失会使集体决策的效率降低。^[3]

“全球南方”受内部组成差异性与多样性和外部大国博弈态势日盛等方面影响，在全球事务尤其是国际话语体系的参与和构建上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具体挑战可以归为以下三点：

第一，美西方杜撰“全球东方”以分化“全球南方”。美欧久居世界中心，难以接受“全球南方”发展为时代潮流的现实和趋势，因而在“全球南方”上大做文章，甚至把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剥离并与俄罗斯并列为“全球东方”的领导力量，以“全球东方”为当今话语叙事陷阱。“全球东方”在2023年之前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用于代指东欧、中亚和东亚地区。然而，随着一些西方学者观点的提出，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含义，并被缩小到仅

[1]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第73-74页。

[2] 杨宝荣：《从“全球南方”看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新特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65-66页。

[3] Comfort Ero, “The Trouble With ‘the Global South’: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April 1,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trouble-global-south#author-info>.

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这进一步限制了“全球东方”概念的广泛接受度。^[1]

西方有人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全球西方”、“全球南方”以及“全球东方”之间的权力三角所决定，这种将中国与“全球南方”相剥离的看法在西方战略界很有代表性。^[2]而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当今世界分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三个群体，将世界重新推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的方向。“全球西方”由美国和欧洲领导，“全球东方”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全球南方”则是由印度和巴西等领导的无定形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集团。^[3]这种“世界三分法”的观点，将“全球南方”视为一个摇摆不定的、不与东西方结盟的阵营，而东西方对“全球南方”的争夺推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急剧上升。美西方只讲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对俄罗斯的中立，而不讲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认同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

西方政界和学界推出“全球东方”和异化“全球南方”另有所图。就“全球东方”而言，美西方贯穿始终的是寻找敌国对手为其领导世界寻找理由。这一行为的意识形态动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扎根美国社会的“天赋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美国历届政府中代代相传。杜鲁门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提道：“世界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期待美国的善意、力量和明智的领导。”^[4]基于这一“使命感”，美国自诩拥有最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其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和理想是整个西方世界共同的追求目标。一旦有国家对它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将利用这一意识形态目标来动员盟伴们支持美

[1] 崔荣伟：《从“全球南方”剥离出一个“全球东方”，然后还把它异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2024年3月24日，<https://iir.sass.org.cn/2024/0324/c439a566613/page.htm>。

[2] “Speech b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Alexander Stubb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Heads of Mission in Helsinki,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August 27, 2023, <https://www.presidentti.fi/en/speech-by-president-of-the-republic-of-finland-alexander-stubb-at-the-annual-meeting-of-heads-of-mission-in-helsinki-on-27-august-2024/>.

[3]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1, pp. 121-138.

[4] Harry S. Trum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9, <https://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public-papers/19/inaugural-address>.

国并共同采取制裁和干涉。纵观二战后的历史，美欧结成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北约），先是把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东方”，后又把世界划为“西方”和“他方”（West and Rest）。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由于自身地位的相对衰弱和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归根结底，现在西方企图杜撰“全球东方”至少出于以下四重考量：

一是似是而非和移花接木。美西方利用冷战时期西方和东方对立的延续效应而制造出“全球东方”，强调对立。马小军指出：“尤其要警惕充满恶意的‘全球东方’概念。冷战时期，所谓‘东西方’是以美苏划线。此番‘全球南方’概念的提出，是否内设了什么‘全球东方’的概念，意图以所谓‘全球东方’把中俄伊古朝等国恶意归在一类，制造什么新的‘全球东西方对抗’游戏，对此须足够警惕。中国绝不重蹈冷战时期的覆辙，绝不会落入冷战式的大国战略对抗陷阱。”^[1]

二是分化和掌控“全球南方”。在分化方面，“全球南方”少了中国就会力量大减，如经济总量、金砖机制、制度选择。美国学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甚至以“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为题，以春秋笔法捏造“中国冲击 2.0”，辅以“中等收入陷阱”和“去工业化”等陈词滥调，恶意中伤中国在团结“全球南方”方面的努力。^[2]在掌控方面，印度当头，便于美西方对其的争夺、拉拢和控制。出任 G20 轮值主席国后，印度在 2023 年初召开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共有 124 个非 G20 国家参加，中国并未受邀。峰会讨论了经贸、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议题，这次峰会也被视为 G20 峰会的准备会议。^[3]在“同一个声音，同一个目标”“赋权全球

[1] 马小军：《非西方中等强国为“全球南方”带来战略支撑力》，《环球时报》2023 年 6 月 25 日，第 14 版。

[2] James Crabtree, “The Coming Clash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1,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9/11/china-global-south-trade-tariffs-protectionism-emerging-markets-economy/>.

[3] 印度还在 2023 年 11 月和 2024 年 8 月先后举办了第二次（线上会议）和第三次“全球南方之声”会议（来自 1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3 位代表受邀），中国均未被邀请。参见“Chair’s Summary: 3rd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India’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ugust 20, 2024,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8186/>.

南方，创造可持续未来”等官方宣传下，“全球南方”也能为印度的全球外交政策提供新框架。^[1]冷战期间，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但冷战后，印度将外交重点放在了与大国交往以及金砖体系上。乌克兰危机以及中美博弈加剧后，印度开始寻求能替代金砖体系的外交框架，“全球南方”正是可能让印度重新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替代方案。如果印度能复制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引领者形象、成为“全球南方”领头羊，这势必将成为第三次赢得大选的莫迪政府的重大外交加分项。

三是孤立和打击“全球东方”。美西方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剔出，归为主要由中俄组成的“全球东方”，进而再把“全球西方”与“全球东方”定性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之争，将美国为首的“全球西方”描述为“开放、多边、以安全协定为国际秩序的基础的捍卫者”，却将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少数国家单方面冠以“全球东方”之名，继而无端罗织“寻求推翻基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保护威权统治免受自由现代性威胁的力量”等罪名，^[2]以此占据道德和战略高地。必须指出的是，美西方此举是以政治意识形态遮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政治领域的民主口号掩盖其未随时间消散的冷战叙事和零和思维，恰恰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性与阶级局限性。^[3]

四是渲染“全球东方”意欲主导话语。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构建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七国集团等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掌控国际组织、制定国际标准，一步步将综合国力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对国际话语权的长期垄断。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断觉醒和不再甘当国际舞台上“沉默的大多数”，美西方阵营出于

[1] “1st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3,”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January 2023, <https://www.mea.gov.in/voice-of-global-summit.htm>.

[2] David Pierson and Chris Buckley, “China and Russia, Targets at G7 Summit, Draw Closer to Fend off the West,” New York Times, May 23,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5/23/world/asia/china-g7-russia-us.html>.

[3] 孙帅：《西方“民主—威权”二元对立论批判》，《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7-114页。

维系话语权优势地位的目的，必会竭尽所能干扰“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阻止其独立性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因此，无风起浪的“全球东方”是继“全球南方领导权”后，美西方如法炮制的又一个话语权陷阱，需要高度警惕。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明辨“全球东方”概念。“全球南方”国家很少提及“全球东方”的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南方”的概念和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利益和合作上，而“全球东方”的概念相对较为特定，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关注点不完全吻合。

就二者概念的定义和关注点而言，“全球南方”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更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际合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维护多边经贸体系、地区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1]而“全球东方”的概念相对特定，主要指的是东方国家内部的力量再平衡，以及在这些国家中被赋予的政治含义，这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关注点不完全吻合。^[2]就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而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体现在对待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上，其不愿与西方一起孤立俄罗斯，质疑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全球观众”（global audience）这一身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回旋余地，并借此角色来提高全球地位和影响力。^[3]相比之下，“全球东方”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影响相对较小，没有“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那么活跃和具有影响力。

第三，俄罗斯另有所指的“全球东方”。俄罗斯十多年前提出的总统纲领性文件《长期战略》便涵盖了“全球东方”概念。^[4]与西方关系的刻意疏离以及对东方合作的日益重视，展示了俄罗斯的全球定位从“西方一员”逐

[1] 赵柯：《如何理解“全球南方”？》，《学习时报》2023年7月31日，第A4版。

[2] 也有学者用“全球东方”概念指代在全球南北之间占据间隙地位的国家和社会，该说法一定程度上继承于20世纪“第二世界”的阈限空间，主要用以打破传统的南北二元叙事。参见 Martin Müller, “In Search of the Global East: Thinking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Geopolitics*, Vol.25, No.3, pp.734-755.

[3] Matias Spektor, “In Defense of the Fence Sitters: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Hedging,” *Foreign Affairs*, April 18,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global-south-defense-fence-sitters>.

[4]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12, 2013, https://thailand.mid.ru/en/o_rossii/vneshnyaya_politika/kontseptsiya_vneshney_politiki_rf/.

渐东移。这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调适，更是俄罗斯在价值观、文化认同以及发展路径上的自我重构。2024年初，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协调人和副协调人会议期间指出，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国家基于不结盟和平等原则的组织基础，俄罗斯将该组织视为多极世界的堡垒。^[1]然而，这一表述中潜藏的复杂性也需要注意，尤其是在语言使用方面。俄罗斯沿用西方提出的“全球东方”概念，可能会因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而导致歧义和误解，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引述这一概念时，应当更审慎地辨析其含义和具体使用的语境。

四、“全球南方”和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整合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全球南方”是其优先发展方向，^[2]也是主要的响应者和共同的努力者。2023年7月，王毅外长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首次详尽阐释中国眼中“全球南方”的内涵及特点，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并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消除冲突，共建和平”“重振活力，共促发展”“开放包容，共谋进步”“团结一致，共商合作”的四点主张。^[3]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再次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4]2024年10月，习近平

[1]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Remarks and Answers to Media Questions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from BRICS and Global South and Global East Countri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une 3, 2024,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6127/.

[2] 张春教授认为，由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不均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先方向仍在于“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参见张春：《“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当代世界》2023年第11期，第14页。

[3] 《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4] 《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主席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高度评价了当下“全球南方”的发展之势，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1]

当前，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关合作正在区域国别、领域、思想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了多维、立体、多向和交叉的局面，既有宏伟目标引导性，也有阶段可操作性。在西方国家凭借传播技术霸权和国际传播网络主导全球性叙事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建设和发展自主话语体系的奋斗过程中，更要紧跟“全球南方”的时代浪潮，把中国故事编织进“全球南方”故事中，讲好中国的“全球南方”故事；将“全球南方”故事融入全球语境之中，讲好“全球南方”视域里的全球故事和全球视野里的“全球南方”故事。^[2]

（一）以相同历史遭遇和相似现实任务为合作基础

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程中结下深厚友谊，在相互支持、互相促进中夯实发展合作的基础。中国同“全球南方”友好互助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即开始向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为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如在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对中国而言，“全球南方”身份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作为国际体系的后发国家，“全球南方”对发展的真实诉求、国际事务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被选择性忽视，而中国始终将“全球南方”作为经济合作、政治互动、战略互信、文化交流的优先选择，在相互扶持中逐渐形成了反殖反霸、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在携手奋斗中形成了互相尊重、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合作传统，可以说“全球南方”承载着中国同南方国家在争取国家独立和

[1]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第1版。

[2] 李思乐、于洋：《转向“全球南方”：中国国际传播新进路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策略》，《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36-39页。

民族解放进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共同破解发展赤字难题的奋斗历程，这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提供了坚实历史基础。

从国际经济的视角来看，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所带动的相关国家经济建设与南方国家依靠自身积累进行投资建设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人类文明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是一种相同的模式。近年来，一些南方国家所取得的丰硕发展成果，将为更多南方国家带来示范效应。这将有助于更多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单一发展理论向多元发展理论转变。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二战后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自决是全球化的一次重大转折，是对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丛林法则的否定。当前“全球南方”的兴起则在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是政治自决向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转变，也是推动国际合作由垄断、排他性合作向真正多边合作机制的转变。

（二）以战略合作伙伴和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从国别层面看，中国主要与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达成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在次地区层次，主要包括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在地区层次，中国已与非洲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国等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这意味着，中国已与相关国家在世界绝大多数地理模块达成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并开展了创造性的实践。

（三）以整合国际话语体系为主要抓手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涉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制度性权力和软实力。前者包括在 多边机构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和经济份额分配等制度性话语权，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后者则涵盖了国家在理念传播、文化吸引力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的软性影响力。“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在宏观层面建立独立、公正的国际传播体系，不仅要通过联合发声在国际舆论中树立权威性，还要担当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和共同发展的

推动者。同时，在具体传播策略上，“全球南方”需关注叙事细节，通过多样化、平等化的表达，展示“全球南方”的多元文化、社会价值和发展成就，使其话语在全球舆论中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从中国角度出发，一方面要依托“全球南方”进行话语体系整合，努力实现“中国故事”和“全球南方故事”的互融互通，构建叙事共同体、传播共同体和国际话语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朝向“全球南方”进行引领，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顶层设计有机融入“全球南方”的内涵与实质，推动共同进步。

（四）以共同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目标

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进程中，“全球南方”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但需要把困难和挑战想得更多一点，把战略和规划想得更加周全些和可行些。在顶层设计方面，“全球南方”积极推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密切跟踪全球问题的发展动态和评估各国全球治理行动，及时扫除全球治理的障碍和制定新的应对方案。^[1]在落实途径方面，中国既能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盛会上当好东道主，向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伸出友谊之手，又要支持俄罗斯办好扩员后的“大金砖”峰会，支持巴西、秘鲁分别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不遗余力地贡献中国智慧，共同点亮全球治理的“南方时刻”。^[2]

五、结语

世界进入近现代以来的500年里，“全球南方”第一次相对平等地与其他主要力量群体讨论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并共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此需要在长远目标指引下切实地予以推进。

[1] 徐秀军：《“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21-124页。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4年3月8日，第3版。

第一，“全球南方”需要通过更加努力地发展经济和科技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应对来自全球经济和技术的挑战，同时也为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创造更多可能性。一是更加努力地发展经济和科技。这是维护自身稳定和造福人民的基础，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应对来自全球经济技术挑战的需要，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新的支点，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新动力。二是“全球南方”要传承和拓展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取向，在新形势下建构新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形象。三是“全球南方”不仅需要坚持“不站队”“不靠边”的战略自主立场，而且还要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坚决反对建立对抗集团和发动“新冷战”，更加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二，“全球南方”还要继续发扬批判精神、重视思想进步和进行理论创新。在发扬批判精神方面，“全球南方”要在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批判美西方的错误言行，如价值联盟、价值阵营、价值对抗、零和思维等。在重视思想进步方面，“全球南方”要在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的基础上坚持公正合理，超越美西方的社会西方化和经济安全化等所谓新思想，在精神文明方面也要如同物质文明方面那样成为世界的主要贡献者。在进行理论创新方面，“全球南方”要发扬不怕美西方理论垄断的大无畏精神，要在总结现有经验和前瞻未来基础上进行基本理论和学术理论创新。

第三，“全球南方”在国际话语叙事方面争取有突破性的发展。“全球南方”兴起的进程是国际关系话语多元化的过程，必将使国际关系中的多元化叙事更加突出。现在和今后的任务就是在个别和部分话语权基础上，构建一套更为普遍、系统的叙事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学界与“全球南方”学界责无旁贷，需要加强合作和共同努力，争取在国际话语权和叙事体系上拥有应有的地位和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宁团辉】